

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

中国历史

第二册

补充教材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T13304 DG

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

中 国 历 史

第 二 册

补 充 教 材

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K7071·502 定价: 0.15 元

本书系北京市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补充教材，讲北京乡土历史，是我们约请北京市 101 中、93 中、28 中等学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供历史教师参考使用。

目 录

一	圆明园的焚毁·····	1
二	俄国东正教北京布道团·····	7
三	颐和园的回顾·····	17
四	义和团在北京的反帝斗争·····	27
五	北京近代资产阶级发家史事例·····	38
六	北京近代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	45
七	我国最早的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51

一 圆明园的焚毁

今天，我们走进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便看到果树成林，稻田环绕。不熟悉这一带历史情况的人，会以为这儿从来就是一片农田，决想不到一百多年以前，这里原是一片豪华瑰丽的皇家园林——举世闻名的圆明园。环顾遗址四周，仍然可以看到残存的虎皮石墙围绕着名园的废墟；巨大的汉白玉石门，屹立在“西洋楼”一带。这些，似乎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过去”。一队队的红卫兵、红小兵，常到这里来回忆阶级仇民族恨，表示彻底埋葬帝、修、反的壮志与决心。

为什么人们对圆明园这样难以忘怀？因为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当年圆明园的辉煌壮丽使我们感到自豪，如今的残垣断瓦，更激起我们对侵略者和剥削阶级的仇恨，激发我们投入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伟大斗争。圆明园是帝国主义侵华的牺牲品，但是圆明园遭遇浩劫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人民血汗帝王园”

北京西郊，连绵不断的群山，环绕着玉泉山水汇成的大小湖泊，形成天然的美景。历代在北京建都的封建统治者，看

中了这一带的景色，相继在这里建造了不少的园林、离宫和别墅。这儿渐渐成了京西的名胜区。

1709年，清康熙帝把明朝贵族的废园赐给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帝），动工修建，并赐名为圆明园。

雍正即位三年以后，在圆明园起造殿宇，深挖湖泊，培植林木，规模逐渐宏大起来。1730年9月30日，北京西郊发生地震，圆明园的宫殿楼阁成为一片瓦砾。震后重修修复。清朝的帝王，住腻了城里的皇宫，说它是“红墙绿瓦黑阴沟”。为了满足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不顾人民死活，从全国大量调用财力物力，精心修建圆明园。乾隆统治的六十年中，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动工。乾隆帝六下江南，搜集天下名胜，在圆明园一一模仿建造起来。至于奇峰异石，不能仿造的，就不惜人力物力，由南方运到北京。另外，又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在园内建造起一组西式宫殿建筑——西洋楼。这在中国园林中，还是创举。乾隆死后，圆明园修建工程并未停顿。道光咸丰时期，中国备遭侵略，人民苦难重重，但他们从未想到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仍然不遗余力地装修圆明园。从雍正到咸丰，前后一百多年里，清朝统治者不知搜刮了多少财力物力，来建造这座中国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皇家园林。真是“人民血汗帝王园”！圆明园集中地反映了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反动统治者的腐朽性。

“万园之园”

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心血和智慧结晶，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无比杰作。人们把它和法国的凡尔赛宫称为世界园林史上的两大奇迹，称它为“万园之园”。

圆明园本身是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组成的，所以又称圆明三园。此外它又有东起近春园、熙春园（现为清华大学）西至清漪园（即颐和园）、静明园（即玉泉山）、静宜园（即香山）等许多属园。东西二十余里，所看到的都是园林飞阁、柳岸山石，呈现出一幅绚丽图画。其中以圆明三园规模最宏大，景色最秀丽，建筑最雄伟。

圆明三园，周围约二十里，玉泉山水东北流，汇成曲折连通的大小湖泊，水面约占全园面积二分之一。湖水依大小差别以湖海定名。有些湖岸用岩石叠成阶梯，上面装有白玉栏杆。陆地上布置起高高低低的假山，山坡湖岸布满花卉林木。在这风景如画的山水之间，建造起千姿百态的建筑群，总共一百零八景。每一景包括很多殿、阁、楼、台、廊、榭、轩、馆。殿宇都用游廊、桥梁委曲相通。桥梁有圆孔、莲瓣孔、拱尖孔与石平桥、木板桥等各种式样，有的还在桥上建有廊屋。全园各处布置着各种镀金铜饰物，如金人、金门、金缸、金桌和形形色色的金兽，数量之多，城内皇宫与其他诸园远不能比。

三园的建筑绝大部分是中国宫殿式的，它不但吸取了历代宫殿建筑的优点，而且有许多创造性的改革，使人每到一处都会感到新奇美妙。如“正大光明殿”是清帝朝会群臣的大宫殿，庄严宏大，雄伟壮丽。园中偏西的“万方安和”则别具风格，建筑形式奇特；房屋建在水里，成一卍字形，共三十三间，冬暖夏凉，显得格外轻巧绮丽。雍正最喜欢在这里居住。福海东岸的“接秀山房”，殿宇梁柱门窗装饰皆用紫檀木，并镶嵌珍珠、珊瑚、翡翠等宝贵物品，确是珠光宝气金碧辉煌。福海中心的“蓬岛瑶台”，据说是按照宋代大画家

赵千里画的“仙山楼阁图”的画意而作的，极尽精妙；这一带湖光山色，真如仙境。长春园中的“海岳开襟”，建于湖中，下边是一座圆形台，台分两层，全围以汉白玉栏杆，上建“得金阁”，楼宇三层，远远看去好像海市蜃楼一样，三园楼阁，以它最为精妙。长春园最北部，东西狭长地带，有一组西式建筑，统称为西洋楼。从西向东有谐奇趣、万花阵、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线法山等别致建筑。西洋楼都用白石砌成，又加精细雕刻，房顶为中国特有的琉璃瓦盖成。例如：谐奇趣楼房石柱都用汉白玉，柱头柱身都仿照罗马式样，花纹刻工活泼美丽，为中国古代宫殿所未有。楼窗卷口用砖石细刻花纹，楼墙嵌五色琉璃花砖，墙身抹粉红色石灰，楼顶覆紫色圆形琉璃瓦。正楼两侧有五色琉璃八角亭，楼前有喷水池。西洋楼有很多喷水机关，其中有兽战、林中猎狗逐鹿和喷水时钟等形式。海晏堂西面有一个三角形喷水池，两边排列着十二种不同动物的铜像，即中国的十二属相，用它们代表十二个时辰，这些动物轮流值班，每一动物口中喷水两小时，表示全日的时间，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喷水时钟。喷出的水成抛物线形注入池中。

整个圆明园豪华壮丽，我们应为中国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有着这样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才能而自豪。

圆明园这一劳动人民的无比杰作，在封建社会里被反动统治者占有，成了清朝皇帝享乐的地方。他们嫌紫禁城呆板枯燥，从雍正开始，一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居住在圆明园内。然而，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又无力保护它，以致让帝国主义侵略者把这一举世无双的雄伟壮丽的建筑焚毁了！

圆明园惨遭焚毁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犯北京，1860年10月5日，侵略军占领海淀，6日闯进圆明园。他们看到各殿华丽的陈设，珍贵的艺术品，贪涎欲滴。他们活象一群恶狼，张开血口，吞噬着人类文化艺术的精华，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比贪婪的本性。侵略军的军官们首先分批进去大肆劫掠，接着联军司令部正式下令可以自由劫掠。于是英法联军从军官到士兵，每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法国侵略军手持木棒，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以棒击毁，必至粉碎而后快”，英国军官赫里斯，第一次抢到一个缕金花盆，金缕之间有用白色珊瑚琢成的文字，盆中栽着一株高一英尺的黄金树，树上挂着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子。赫里斯把这个盆景连同其他珍贵物品，总共装了七筐。第二次他抢到一座七英尺高的金塔和其他许多东西，找了七个士兵替他运回兵营。法国侵略军一名团指挥官抢得的珍珠和金钢石，就值八十万法郎以上。《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从北京发回的通讯中写道，“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時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珍贵的瓷器和珐琅瓶，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美帝国主义也趁火打劫，从圆明园、畅春园等处抢去一大批宝物，其中一些精美的陶瓷，现在还摆在纽约的布洛克林博物馆。美帝在这次和以后多次的劫掠中，抢去我国无数珍宝、文物。仅中国历代名画，被它们攫取的，如果列举画家姓名，足以排成一部完整的绘画史目录。圆明园中许多极其精美的丝绸、瓷器、古铜器、象牙雕刻的珊瑚屏风……都

被侵略者任意撕毁、打碎和践踏。这些强盗们，彼此交易着赃物，并用拍卖的方法出售这些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艺术珍品；然后把拍卖的钱，按等级分给军官和士兵。

侵略军洗劫圆明园以后，还不满足。英国的全权专使额尔金发表罪恶声明说：“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此举足以使中国及其皇帝产生极大的震动。”英陆军司令格兰特完全支持这一野蛮的声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早就担心什么“额尔金对待中国人过于温和。”他批准烧毁圆明园的暴行，并对此表示“衷心高兴”。侵略军的头目，在他们资产阶级政府的支持下，下令焚毁圆明园。

1860年10月18日清晨，英国密克尔骑兵团一大队三千五百人开赴圆明园纵火。他们分头同时行动，一时圆明三园顿成一片火海。至19日晚，全园都焚毁了，火势三昼夜不熄。英国的斯文候记载：“浓烟结成黑云，迷漫北京天空，向东南流动百余里。行近宫殿，火声如吼，日光自浓烟中透过，照草木俱成凄厉之色，纵火士兵为火光所照，形同魔鬼，奔驰园中，为状惨绝。”莪尔丝莱回忆说：“灰星直落城里街巷中……此两日中，天光黯淡，就像日蚀一样，附近一带地方，亦都黑暗。”19日，联军头目又派密克尔马队火烧清漪园（今颐和园）的一些建筑，又烧玉泉山十六景、香山二十八景及园内北部著名的宗镜大昭之庙的八十一间铜殿（据传这个殿的屋顶是铜瓦包赤金）；同时一火烧光畅春园和海淀。侵略军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理智而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破坏中国文物的残暴程度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

圆明园惨遭焚掠，是人类文化史上无法估计的损失。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毁灭了驰名世界的名园，毁灭了古今中外

建筑艺术的精华，毁灭了中国劳动人民心血和智慧结晶，而且毁灭了不可数计的艺术珍品、历史文物和金珠宝物。侵略者这种毁灭人类文明的滔天罪行，将永远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和他们本国人民所唾弃。

二 俄国东正教北京布道团

沙俄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的出现

在今天北京东直门内针线胡同有个东城区塑料六厂，厂里有座库房。库房的面积不大，样式很特别：从外面看去，那是一座圆顶古西式建筑，顶尖已经没有了；屋内有天窗和雕花的梁柱，还有供停灵用的台子。整个屋子呈深古铜色，一进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这原来是沙皇俄国东正教^①在北京的第一座教堂。

这座教堂是清朝康熙年间修建起来的。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沙俄殖民主义者从西伯利亚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时候，就在我国的雅克萨修建了东正教教堂。他们为了便利殖民统治，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东正教。清军收复雅克萨的时候，俘获和招降了一批俄国人。清政府把他们编成百人队，安置在北京城东北角的胡家圈胡同。在这些俄国人中，有一个沙俄东正教教士列昂节夫。康熙帝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赐给他们一座庙宇居住，供给他们衣食，发

① 基督教的一个派别，来源于东罗马帝国。

给年俸，允许同中国人通婚，还准许他们信仰自由。不久，这些俄国人把赐给的庙宇，擅自改成东正教教堂。列昂节夫做了教堂的神父。他利用清政府的优待，在俄国人娶的中国妻子和她们的亲友中发展教徒。为了活动方便，他极力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梳起清朝人的辮子，乔装打扮成“中国人”。

列昂节夫在北京的活动，立即受到沙皇称赞，说“此事甚佳。”俄国东正教会给列昂节夫送来教会证书，把这座教堂正式命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并指示列昂节夫为吸收更多的中国人信奉东正教而努力。当时北京的老百姓称俄国东正教堂为“罗刹（恶魔的意思，又同俄罗斯的读音相近）庙”，后来又称它为俄罗斯“北馆”。

沙俄政府为了利用东正教在中国搞侵略活动，有意在来华的俄国商队中间安排若干神父随行，以便同北京的“罗刹庙”建立联系。1703年，俄国来华的商队中，有九名东正教会人员混在里面。1712年，俄国东正教会借口在北京的东正教士列昂节夫年迈多病，请求另派教士接替，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三年之后，沙俄派出了第一个俄国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由十人组成。他们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正式建立了传教据点。那时候，外国在中国还没有大使馆。东正教北京布道团，就成了俄国驻中国的官方代表机构。它披着“教会”的外衣，实际是沙俄安在北京的对华侵略据点。

1727年，沙俄政府把北京布道团改为常设机构，每十年轮换一班。1732年春，布道团又在北京东江米巷（今反帝东路）的俄罗斯馆建立了另一座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就是后来俗称的“南馆”。

1860年俄国公使馆设立以前，布道团直接归沙俄外交部管辖。布道团的成员都由政府的军事或外交机构派遣，在十至十二名成员里，神职人员只占三、四个。十九世纪以后，沙俄政府对北京东正教会加强了控制。布道团每次换班，政府还派一名军官担任监护官。布道团的成员中，还派有不少来华学习汉文和满文的学生，他们在布道团的精心培育下，成为侵华的骨干力量。这批学生以“中国通”的资格，直接参与沙皇侵略中国的阴谋策划活动。

1860年以后，布道团的外交权限交给了俄国驻华公使馆。它形式上好像成了单纯的传教团体，实际上还是从事侵华活动，不过更隐蔽罢了。

布道团的经费，大部分由俄国国库开支。1820年以后，每年的经费增加到16,250卢布。同时，布道团还接受恰克图、张家口、汉口和天津等地俄商的资助。

披着袈裟的豺狼

东正教北京布道团的一项经常任务，就是刺探我国情报。为此，沙皇政府多次向布道团布置任务，还千方百计扩大布道团的活动范围和政治影响。

1725年，沙俄外交部向来华谈判边界问题的全权代表，发出秘密训令，要他向清政府力争允许布道团的人员，不仅能在北京自由居住，“并且能不受限制地到博克达汗陛下（中国皇帝）统辖的其他地方探望自己的教徒”。

沙皇政府要求布道团从四面八方来刺探我国的情报。1781年第七届布道团来北京之前，沙俄外交委员会明确指示他们设法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况”。1818年，

沙皇政府又向布道团下达新的训令，“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后来，俄国宗教事务部又发公文督促布道团搜集“中国农村经济和家庭生活”的情报资料。

布道团秉承沙皇政府的旨意，从一开始就以刺探和盗窃我国的情报等非法活动为主。

第一届北京布道团的首领依腊离宛，就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沙俄奸细。他来到北京以后，千方百计结交清政府官吏，刺探清政府的机密。

1738年，布道团成员、在清政府理藩院^①充当翻译的俄国“学生”罗索兴，盗窃了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送给沙俄政府，因此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

1756年，俄国来华商队伙同布道团的人员，用1500卢布的高价，偷偷从清宫收藏的地图上描绘、复制了一套《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转给俄国枢密院^②供秘密考察使用。

1809年至1820年的第九届布道团首领俾丘林，在北京期间，经常换上中国人的衣服，逛市场，串胡同，用目测和步测的办法，绘制了一张《北京城廓图》。他还利用教士身份结交清政府的权贵和蒙藏等族的上层人物，大肆搜集我国边疆地区的情报资料。他先后写出《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等十一种有关我国边疆地区的书，还翻译了《蒙

① 清朝管理各少数民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

② 沙皇的咨询机关。

古律例》等多种书，适应了沙俄侵略我国领土的需要。沙俄为此吹捧他是“俄罗斯汉学之父。”他在离开北京时，带走的图书、手稿重达14,000磅，由十五只骆驼运载。

第十一届布道团的监护官原是沙俄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他利用“宗教人员”的身份，非法闯入我国黑龙江地区刺探情报。回国以后，他起草了一份武装占领黑龙江的详细计划，受到沙俄政府的赏识。

第十二届布道团是在鸦片战争前夕来我国的。临行前，沙皇政府一再指示他们进行间谍和行贿活动，想方设法取得“中国政府中那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中华帝国政治事件进程人物的好感。”还作贼心虚地指示布道团首领佟正笏(hù)，要他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只盖私章，不盖布道团的公章，“否则中国人将把此项报告看作官方文件，从而对报告的内容表现出过度的好奇心”。佟正笏到北京以后，四处“搜集情报，观察和注视中国政府的动向”，他提供的情报甚至起了指导沙俄外交部的行动路线的作用。

第十三届和十五届布道团首领巴拉第，在我国活动了三十年，广泛搜集我国边疆地区的政治、军事、贸易、民俗、宗教等方面的情报。1853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侵占我国黑龙江北岸的计划，就是根据巴拉第在乌苏里江“调查”所提供的详细情报制订的。1856年，巴拉第还参加了“璦琿条约”的谈判，从中出谋献策，强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巴拉第由于侵略我国有功，受到沙俄官方的嘉奖。

第十四届布道团的首领固礼，是个臭名昭著的俄国间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离开北

京之前，向固礼布置了几项任务：密切注视和搜集与俄国及其他列强有关的情报并及时向俄国汇报；竭力传播对俄国有利的传闻和消息，并向中国表示俄国将严守“中立”，还要暗示必要时俄国愿意出来“调停”。最后还指示固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让教会赖在北京，以便通风报信。固礼在伊格纳提耶夫走后，卖力地搜集情报。1860年7月，他给伊格纳提耶夫的信中，不仅汇报了有关太平天国革命的情况和清政府的困境，而且建议伊格纳提耶夫说服英国侵略者，趁清政府极度虚弱时机，从速前来北京。这年8月，固礼又派传教士化装成中国人去天津送信给伊格纳提耶夫，报告了清军和清军重炮队在通州集结的情报，以及北京城和京津路上清军布置的情报。伊格纳提耶夫见信后，立即把这一情报转告英法侵略联军的首领，还建议联军“尽快进入通州”，不要让清军“有在这个城市设防的时间”。他又让这个传教士亲自向联军首领汇报北京城里的情况。沙俄东正教北京布道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象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俄国教会“变成了……对外进行掠夺的工具”^①。他们十足地充当了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特务间谍！

沙俄商业资本的坐探

沙俄东正教北京布道团还热衷于刺探我国的经济情报，为俄国商业资本夺取中国市场效劳。

十七世纪末，俄国商队初次来北京，就和北京东正教布道团相勾结。商队的译员和向导，大都是东正教教士和教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2页。

担当的。同时，布道团又把从我国刺探的情报，交商队带给沙俄政府。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俄国国内市场萧条，沙俄政府急于向中国扩大市场。沙俄外交部责成北京布道团，搜集中国经济情报和对俄国商品需要的情报，搜集西方对华贸易情报。沙俄政府又拨出巨款，作为收买清朝官吏的活动经费。

第十一届布道团首领魏若明，搜集我国经济情报，为俄国商人带来丰厚的利润。他在一份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呢绒的价格和销售情况，建议俄商少向中国推销这些纺织品，而应重视其他领域的货物。他建议俄商向中国进口镜子，还具体说明镜子的尺寸和形状。俄商按照魏若明的情报推销商品，仅恰克图一地的俄商向中国出售的镜子，从1843年到1847年四年间，销路增加了三倍多。

沙俄外交部还经常把对华输出的货物样品送给布道团征求意见。第十二届布道团首领佟正笏看了沙俄外交部送来的对华输出的货物样品以后，告诉外交部说俄国布的质量宽度可以，不过花色不如西方的精美。照他的意见，俄国应该增加平纹细布的输出，因为中国人广泛使用这种布。从此以后，沙俄对华输出的平纹细布，一年比一年多：1845年为五千零九十一卢布，1847年达到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七卢布。鸦片战争以后，俄国绒布的销路受到英国的影响，佟正笏又建议俄国政府在中国西部开辟新市场。后来，沙俄政府就向我国提出在我新疆地区开展贸易的要求。

第十三届布道团首领巴拉第在任期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巴拉第向沙俄政府写了一份绝密情报，说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茶叶的北运，可能导致茶叶贸易大幅度下降。这